

第二十五章 中国学术传统的特点与价值

(译文修改稿)

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围绕冷战结束后兴起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而展开的。开始的几章挑战了西方大学所建立的知识模式。两个世纪以来,这些知识模式通过其殖民地和后殖民地在世界广为传播和接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接着的章节揭示东方文明对知识和近代高等教育制度模式的历史贡献。本书的中间章节分析了在历史上、特别是在现代时期所存在的跨文化知识迁移中的不平衡和问题,提出了可以解决和缓和的方式,即通过制定政策和在迁移过程中允许双边参与者进行自由选择。紧接着的几篇论文讨论了现代知识和现代高等教育机构能够保持和加强其自身与各种本土文化联系的途径,从而在国际化和本土化之间建立良好的平衡。

本书的最后部分关注的是中国文明及其与西方世界在历史和当代的互动过程。正如绪论中所说,关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我们的探讨是从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几个非常实际的考虑出发,也是以中国的教育为例开始讨论。因此,这本书也应以关于中国的话题来结束。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古代的科学和艺术给世界做出的巨大贡献;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当角色转换的时候,即中国从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艺术的贡献者转变为接受者时,中国学者和思想家们在近代所面对的困惑。关于中国与西方的这些互动的中西不同观点均在这一部分的章节中分别阐述。

本书的倒数第二章,由汪永铨和李曼丽撰写,审视了中国大学及在二十世纪由于外部压力而经历的发展过程。最显著的结果是知识分类的高度专业化趋势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国家发展目标。这个特征与中国的文化和知识明显相悖。然而,这是为了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必然。王和李指出,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大学课程中体现知识分类的综合性才成为可能。综合的知识分类代表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也是中国学者对二十世纪不同时期一系列西方影响所做出的选择。这一章是原版和新版中的最后一章。

然而,有人提出,对欧洲大学和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发展的这种叙述,是对王、李章节的补充,书的结论部分再增添一点儿内容就可以了。但是我认为,这个章节的目的是,以探求的方式进行回顾,从而理解两种不同传统中价值观和认识论的不同根源。这一章也对未来进行展望,探讨中国学术价值观和学术模式对全球高等教育的可能贡献。

这一章首先讨论了欧洲的大学及其核心价值观和知识模式在十七世纪初是如何介绍

到中国的，然后将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模式与西方的进行比较。这一章的第三部分分析了德国、法国、苏联和美国这四个不同现代化背景中的欧洲大学模式。除了在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发展上的不同之外，我们发现四种模式中有一些共享的价值观。本章的第四部分讨论了中国近代大学的演进，以及西方大学的四种模式在二十世纪不同时期对中国产生影响的方式和途径。通过反思，本章最后部分得出的结论是，已经在现代中国高等教育中重新得以体现的中国丰富的学术传统的价值观和模式，可能对二十一世纪全球高等教育发展产生重要作用。

欧洲大学的核心价值观

欧洲十二世纪大学的产生标志着早期中世纪的结束和对全球都有深远影响的文化及知识复兴的开始。尽管早期的欧洲大学都是国际性的学府，向全欧洲所有的学者和学生开放。但是在几百年之后，欧洲大学与中国的高等学府才开始接触。中国的高等学府比欧洲的产生的更早。十六世纪耶稣教传教团体在中国开通了双向交流的渠道^[1]。意大利的耶稣教传教士最先向中国读者详细介绍了欧洲的大学。公元1622年，吉由利奥·艾乐尼（Giulio Aleni）出版了中文版《西学番》（A Summary of Western Learning）。他通过这本书向中国学者介绍了具有400多年历史的欧洲大学的成就和特征。十二世纪以来产生的欧洲大学所依据的是亚里士多德和托玛斯思想的模式，很自然，艾乐尼如实地描绘了欧洲大学的这个画面。《西学番》的重点是知识和知识的分类。艾乐尼用恰当的中文来翻译西方概念的能力展示了他的杰出的语言天赋和对中国学术背景的深刻理解。

艾乐尼描述了^[2]欧洲大学及其知识结构的等级性，从下到上分别为：艺术、哲学、医学和法律。结构的最顶端是宗教法规，是至高无上的，称作神学。艾乐尼对每一类知识都做了详尽的介绍，阐述了每一类知识与上一类如何有关，神学是如何与知识的所有领域相结合的，以及神学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和意义等。他对“神学”的中文翻译是“天学”，这是很恰当的。他说：“如果没有天学向我们揭示万物的始末，人类的起源与命运，生命与死亡，所有人类的研究就象萤火虫一样，不能与太阳的光辉相比拟”^[3]。

1. D.E.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 Press, 1989).

2. Bernard Hung-Kay Luk, “Aleni Introduces the Western Academic Tradition to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A Study of the *Xixue Fan*”, in Tiziana Lippiello and Roman Malek (eds.), “*Scholar from the West*” *Giulio Aleni S.J. (1582-1649) and the 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a* (Brescia: Fondazione Civiltà Bresciana and Sankt Augustin: the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1997), pp.479-518

3. Ibid. pp. 509-510.

从这个叙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诞生于十二世纪的波伦亚，巴黎等中世纪欧洲城市的大学。其同一课程结构一直延续到后来几个世纪，大学中设文学院，**哲**学院，法律和神学院。大学的核心价值观是自治和学术自由。中世纪大学的组织机构受修道院、行会（同业公会、协会）和教会的影响，这种结构保护了大学的自治。修道院对大学的影响是，体现远离当前社会需要的悠久传统，学习是为了求知本身和长远的目标。同业公会对大学的影响是，产生了大学模式运行的规则，如确定学生入学标准，确定大学内部管理的规章制度和大学学者自我管理的规则。教会的影响是，教会的特许状是具有法律地位的章程，保证每一个大学成员在任何地方从教的权利，保证他们的工作不受地方宗教及政治当局的干扰。在大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对宗教和政治当局干扰最有力的反抗就是把大学搬迁到另一个城市、或进行一种中世纪式的罢工，即在当地宗教或政治机构中工作的所有大学毕业的成员罢课。

这样，大学就形成了自己的特有形态，独立于政府和教会之外，这是中世纪欧洲的另一个巨大的力量。学术自由受教皇和大学特许状的保护，保护学者们能够自由地论争和探讨任何问题，包括对地方教会和政治领导非常敏感的问题在内。神学对知识的探究有某些限制，但是它对知识综合具有重要的作用，这种综合对知识的发展很重要。在欧洲大学，有一位知名的英国史学家名叫哈司丁斯·拉什达尔（Hastings Rashdall），他对神学的综合作用的评价是：“神学是科学之王，神学是庄严崇高的……神学不仅仅是中文官方语言中的‘专心阅读圣书’的意思，它是在知识上具有完整体系的科学，它的职责是吸收所有科学的成果并把它们综合为一个整体……”^[4]拉什达尔特别关注巴黎大学神学家的解放（释放、自由）角色。这所大学创设了宽松的智力环境，即可以自由地进行理性的辩论来探讨有争议的宗教和社会问题。而在南部欧洲，宗教法庭常常通过非理性的、感情冲动的、非常专断的方式来裁决这类问题^[5]。

在这个阶段，知识的专门化是大学传统的重要特征。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专门化又被神学的综合性所削弱，从而使所有的知识都与共同接受的伦理及精神的指向相联系。于是，与“学术自由”相比，“智力自由”在中世纪可能是一个更为合适的表述。“学术自由”的概念可以用在近现代阶段的大学发展特征上。在这个阶段，在近代科学出现之前，“价值观中立”的提法还没有出现，所有的大学知识都服务于神学所限定的道德和精神指向范围。

4. Hastings Rashdall,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Vol. 111, p.442

5. Hastings Rashdall,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6), Vol. 1, pp.548-549.

中国学术传统的核心价值观

让我们现在转向对中国十七世纪初期的学术机构及其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的讨论。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在十二世纪进入了成熟阶段，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产生时间极为相似，这是非常有趣的巧合。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宋朝统治之下，新儒学已成为学术的支配形式（独尊儒术），几个知名儒学思想家的著述也相继问世，其中最著名的儒学大师是朱熹。公元1190年，朱熹使作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儒学知识标准化，即四书五经，并一直作为正经延用到二十世纪初期的最后一个封建朝代清朝。传统的中国高等教育的指导原则和目标，以及在都城、省城和地市进行科学考试的官学学府-太学、国子监、翰林院等都已经制度化。此外，朱熹对民间学术机构-书院的产生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书院产生于图书馆和偏远农村的佛教庙宇。在那里，学术的发展可以不受帝国权威及其科举制度的限制。

从十二世纪一直到十九世纪后期，中国高等学府的传统课程是以知识的四种分类为主体的：古典世俗法规与注释（经）；历史与相关学科（史）；哲学（子）；艺术或文学（集）。“这种体系是以儒家的学术观为基础 - 用词语表达“道”，用行为行动描述历史”^[6]。艾乐尼在介绍欧洲大学时指出，根据欧洲大学的课程基础，中国知识的四种分类均可以归为人文学科。事实上，中国在医学、法学、工程学和农学等方面都曾得到很好的发展。但是，这些学科在知识体系中地位不高，未被列为考试的内容。这些学科被看作是技术性知识，由士大夫进行管理和监督，从而服务于共同的利益。

中国古代高等学府的传统课程不象欧洲中世纪大学课程那样明显的等级性。在古代欧洲大学，神学被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学问，能够规范和综合所有其他学科的知识。而中国的传统知识分类中没有神学，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先验的（超自然的）和世俗的都是宇宙的有机统一体的互补部分^[7]。”中国高等学府的知识体系强调道德自我的完善和独立性，强调能够唤起、扩大和实现人的本性中内在良知的自我修养。

中国传统的高等教育是在科举制度条件下形成的。科举制度允许皇帝选择士大夫，通过“学而优则仕”来管理国家。科举考试的内容是由翰林院决定的，主要集中在四书五经上。考试是由礼部来负责的，礼部领导地、省两级的教育部门，这两级教育部门负

6. Bernard Luk, "Aleni Introduces the Western Academic Tradition to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1997, p.486

7. *Ibid.* pp. 511-512.

责执行会试及殿试之前的各等级科举考试。科举考试成功者成为封建王朝管理体制中的官吏（士大夫）。在成功的考生及他们的考官之间，同年中举者之间均有密切的人际网络关系，从许多方面看，这与欧洲大学的师生群体相比，都是对社会更具有影响力的群体。

翰林院并不具备欧洲大学的自治性，但是它具有对全国进行学术垄断的特征^[8]，是封建帝国官僚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很好地掌握了所规定的知识标准，才可能成为国家官吏。十七世纪的耶稣会会员曾对中国的学识认可及报偿方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十九世纪的英国访问者对此极为赞赏，他描述道：“整个中国就像一所巨大的大学，大学是由大学内培养出来的学者来管理统治的^[9]。”

中国古代翰林院的成员和士大夫阶层都不享有欧洲大学学者所看重的智力自由，但是他们都有很高的智力权威。即便是皇帝如果他的政策和行动违背了儒家经典的规范，他们都可以进行批评。在中世纪欧洲普遍存在着教会和世俗皇帝统治之间的张力，而在古代中国没有这种情况。此外，在当时的中国，商业和（工匠人）行会的经济影响相对小的多，而这些正是欧洲中世纪城市的特点^[10]，这些城市相对独立于教会和皇帝控制之外。

翰林院具有很大程度的学术权威和学术支配地位，对整个封建帝国都有影响力。与此相反的是书院这一非正规的民间学术机构。这些书院一般都建在中国各地比较偏远的地方，往往都在庙宇或藏书楼里。书院的人有些是在皇宫不得志的学官，有些是不愿意在朝廷动荡时期为封建王朝服务的士大夫。他们在藏书楼周围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小社会，进行研究和思考。书院里研习的内容通常比科举考试的内容要宽泛的多，包括佛教，道家思想，以及其他异端演说和著述。研习的模式是非正式的，一名大师（通常是书院负责人或禅杖）带领并指导许多年轻的学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进行学习。学习的方式包括激烈而活跃的辩论，例如批评封建朝廷的问题。书院也是对新知识进行思辨并将其综合到传统的知识规范中的重要场所^[11]。

8. Adam Liu Yuan-ching, *The Hanlin Academy 1644-1850* (Connecticut: Archon Books, 1981).

9. Quoted in Teng Ssu-yu, "Chinese Influence on the Western Examination System",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7, No. 4, 1942, p. 290.

10. William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William Rowe,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These two volumes provide a rich and textured challenge to the longstanding Weberian thesis about the bureaucratic nature of the Chinese city, yet they do not entirely negate it.

11. John Meskill, *Academies in Ming China* (Tucson, Arizona: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2).

在某些时期，书院尽享自治。但是在有政治变动的时候，封建朝廷也要控制书院使之成为科举制度服务，或由于书院是“政治叛逆”而被迫关闭。因此，书院是脆弱的自治，没有欧洲大学的特许状而为之提供保护，也不能在全国各地建立独立的学术团体。一方面，书院学者在特定时期享有的智力自由非常广泛，这对学术发展非常重要。然而另一方面，书院又是脆弱的，在某些时期则会受到封建朝廷的镇压。

因此，中国的古代学府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核心价值和模式都很不同。中国学者享有高度的知识权威和以自己作为官员的身份来影响帝国的能力。而书院作为民间独立的学府只拥有一定的智力自由和一定的地方权威。从结构上看，在政治权力和学术知识之间没有清楚的界线划分，而学者的非正式的权威影响和士大夫地位的正式权力之间的张力则是持续存在的。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西方中世纪大学是由神学来统治的，所有其他学科只能从属于神学之下，神学将这些学科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统一起来。相反，在中国古代，古典名著（经）、历史（史）、哲学（子）、文学（集）等四个领域的知识发展是由学者的自我修养以及终生追求美德和精神完善来实现的。

中国士大夫在封建王朝中的作用是，确保所有的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以一种服务于社会统治利益的方式得到发展；与此同时，书院的学者们却能在远离皇宫的民间学府中审视和批评政府，确保世俗法规的活力和连续性。这种模式是成功的，它繁荣了中国古代科学和精神文化。这种模式不但在当时，而且一直到十八世纪中晚期都得到了推崇^[12]。

在中国古代高等学府和欧洲中世纪大学之间的共同点是，在其形成建立的十二世纪，妇女都被排斥在正规的学术知识参与之外。在两种文明中，高等教育的产生都在同一时期，这是一个历史的巧合。关于欧洲大学的建立，大卫·诺贝尔（David Noble）著述了这个过程，大学在开始建立时，妇女就被排斥在学术生活之外，归因于的神职人员（牧师、僧侣）的独身生活。这与早期教会机构中女主持（女修道院长）和女学者所起的重要作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3]。黑尔德卡得·斌根（Hildegard of Bingen）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她在宇宙哲学、伦理学、医学等领域均有学术论述，她还与几个教皇和君主在学术和社会重要议题上进行频繁的通信联系，她在大学建立之前就进入了社会的学术主流^[14]。

12. Joseph Needham, *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edited by Colin Ron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13. David Noble, *A World Without Women: the Christian Clerical Culture of Western Science*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92).

14. Peter Dronke, *Women Writers of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44-150.

在中国历史上，唐朝（公元698 – 907年）是文化的繁荣开放时期。佛学从印度引入，强化了中国哲学遗产中道家的一些开明理念，因而妇女也能够宗教和学术活动中充当积极的角色。特别是在佛教尼姑庵提供的机会中，妇女的参与尤为明显^[15]。然而，十二世纪中国最大的儒学家朱熹却反对佛家思想，旨在恢复和巩固儒家思想的地位，其中包括明确妇女的家庭义务和任务，坚决反对妇女参与宗教和学术^[16]。

那时，欧洲大学的发展以日益增长的专业化和强调价值中立为特征。然而，新儒家哲学的知识模式并不象欧洲那样与妇女无缘。一个对中国妇女历史的研究最近发现，女文人以某些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积极作用，例如当巡回教师，出版诗集和著述，建立某种妇女社团机构，特别是在南方比较繁荣富裕的江苏省和浙江省，这种情况比较普遍^[17]。

在十六和十七世纪，中国被公认是欧洲的样板^[18]。中国被推崇的主要原因有三：中国古代科学在农业和工程方面的成就；中国对不同宗教思想共存的兼容；中国的世俗特征。乔治·布曼（Gregory Blue）在他的著作的第20章中有力地阐述和论证了这一点。中国的瓷器，家具，丝绸墙纸，建筑风格以及许多艺术品在当时的欧洲极为流行，在十九章比得·斯万（Peter Swann）的生动描述中可以充分地反映这个状况。在这个时期直到英国的鸦片贸易之前，中国与欧洲进行的贸易往来是很成功的，出口瓷器，丝绸和茶叶，换取银币。

欧洲工业革命和近代科学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强大而繁荣的地位，使中国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时变得落后和软弱可欺。许多学者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出现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或其他拥有丰富古代科学遗产的东方国家^[19]？这个问题超出了这篇论文的范围。然而，当我们比较欧洲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时，值得我们回忆的是，欧洲大学不总是被史学家们看作是科学革命的领先机构，相反，科学院等专门的研究机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5. Kathryn Tsai, "The Chinese Buddhist Monastic Order for Women: The First Two Centuries", in Richard Guisso and Stanley Johannesen (eds.), *Women in China: Current Directions i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Lewiston, 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1981), pp. 1-20.

16. Bettine Birge, "Chu Hsi and Women's Education", in W.T. de Bary and J. Chaffee, *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 St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325-367.

17. Dorothy Koh,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18. L.A. Maverick, *China: A Model for Europe* (San Antonio, Texas: Paul Anderson Co., 1946).

19. In chapter 7 of this volume, Len Berggren emphasized the point that medieval Islam made active and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sciences it had adopted from Greece, and described some of its fine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然而，大学作为发展知识的主要场所是与所属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紧密联系的机构。无论各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传统是如何的不同，几乎全球所有的国家都认可大学对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作用。一些殖民地国家和中国、日本、泰国等非殖民地国家的近代先驱者们都为本国的现代化做出了的竭尽全力的努力，反映了高等教育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性^[20]。

西方现代大学的四种模式

在德国、法国、苏联和美国发展起来的现代大学，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广为学习和仿效的高等教育模式。这一部分主要讨论这四个代表性的大学模式，二十世纪以来，这些大学模式都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当时的领导人先是在民族主义的政体下寻求资本主义，之后又选择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大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中，西方大学的宗旨（核心价值观）－自治与学术自由在不同程度上并以不同的方式得以保留和继承。

柏林大学于1810年由洪堡德（Wilhelm von Humboldt）建立，这所大学在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对全球高等教育都有很大的影响^[21]。在这个模式中，哲学取代了神学作为科学之王的地位，学术自由，包括教的自由和学的自由都在一个相对专制的国家中得以延续。大学学者专注于人文与科学领域的理论发展，并且以极大的自制来不直接干预国家的政治生活^[22]。传统的专业例如医学、法律等仍旧保留下来；与此同时，新的应用学科如工程学、商学等都在不同的工科大学得到发展。新的应用学科在大学的发展是与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政府和工业界的努力紧密相联系的^[23]。

20. P. Altbach and V. Selvaratnam (eds.), *From Dependence to Aut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Asian Universities* (London: Kluwer, 1989).

21. Wilhelm von Humboldt, "On the Spirit and the Organizational Framework of Intellectual Institutions," in *Minerva*, Vol. 8, April 1970, pp. 242-250.

22. Fritz Ringer, *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ate* (Cambridge, Mass.: 1969), especially chapters 1-3.

23. Isolde Guenther, "A Study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German Technische Hochschule",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1972.

德国大学的自治受到政府的法定保护，这与中世纪大学的自治受到教皇的保护很相像。这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基础理论知识的发展是对国家的机能状态至关重要的大事。因此，大学的学者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并作为国家公务员的身份来产生社会影响，但是他们不应参与政治的或社会的行动。十九世纪德国的学术繁荣既表现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上，也表现在文学，历史，哲学和艺术等人文学科上。德国的学术繁荣证明了这种模式的优势。它既创造了对实现经济现代化任务实际有用的知识，也保留了质疑的空间，不管是什么样的基本原理，都可以在大学里质疑和辩论。

然而，具有这样优势的大学却不能勇敢地站出来面对二十世纪西特勒及其法西斯主义的猖獗，这种状况引起人们深刻思考大学的道德和精神知识的适当性，弗来德端克里尔格（Frederic Lilge）在《学习的弊病》（*The Abuse of Learning*）^[24]中揭示了这个问题。康德主义者将事实与价值观相区分使科学和社会研究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允许哲学成为所有知识的综合者和仲裁者，而把社会伦理方面的议题留给公开的民主辩论^[25]。韦伯（Weber）的“作为社会行业的科学”这一著名论文生动地描绘了大学知识在精神、伦理和政治之间保持中立的可能性和阻碍^[26]。大学的学术自由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价值中立的，这就使大学不能有效地面对法西斯主义的挑战。韦伯指出的“回避道德和精神议题”是现代德国大学学术自由的一个特征，它与中世纪大学的智力自由不同。

20. P. Altbach and V. Selvaratnam (eds.), *From Dependence to Aut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Asian Universities* (London: Kluwer, 1989).

21. Wilhelm von Humboldt, “On the Spirit and the Organizational Framework of Intellectual Institutions,” in *Minerva*, Vol. 8, April 1970, pp. 242-250.

22. Fritz Ringer, *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ate* (Cambridge, Mass.: 1969), especially chapters 1-3.

23. Isolde Guenther, “A Study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German Technische Hochschule”,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1972.

24. Frederic Lilge, *The Abuse of Learning: The Failure of the German University* (New York: McMillan and Co., 1948).

25. Paulsen, Friedrich, *Immanuel Kant* (London: John Nimmo, 1902), describes Kant’s achievement in this way: “This gives to knowledge what belongs to it - the entire world of phenomena for free investigation; it conserves, on the other hand, to faith the eternal right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life and the worl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value”. (p.6).

26. Max Weber, “Science as a Vocation”, in H.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法国近代大学的演进与德国的有很大不同，学术自由与知识的高度专业化相联系，学者被看作是专业人员。在法国革命时期，传统的大学被废除了。在十九世纪早期，拿破仑政府建立了新的教育制度，其特征是：在国家的每一个大学区都建立医学院、法学院、人文与科学学院，这些学院均由巴黎的大学审议会来领导，大学审议会把握整个高等教育制度的方向。新的知识领域比如工程学，商业和管理等对国家现代化极为有用的专业都设置在高等专门学校里，这类高校比传统的综合性大学地位要高，毕业生享有直接到政府部门领导职位工作的机会^[27]。法国著名的国家考试用来在这些高等专门学校挑选精英以作为未来的政府官员，这种通过国家考试录用政府人员的做法深受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影响^[28]。

法国近代大学的长处在于它的包容的理性主义和世俗性，以及其传统专业领域以及新的应用领域中的专业化知识服务于国家现代化的方式。从自治这个方面来看，大学被称为国家大学，国家有权对教育的所有方面进行立法，大学并不直接隶属于政府，而是要忠实于国家长远利益和目标^[29]。学术自由与现代知识的高度专门化相联合。要求大学人员是学术专业人员，这与德国大学注重基础理论知识的情况不同^[30]。汪永铨和李曼丽的文章阐述了这种现代高等教育模式先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受外力的影响而在中国产生吸引力的原因。

苏联的大学模式在历史上很大程度地受法国和德国的影响，但是法国模式的知识专门化对其影响最强^[31]。1917年俄国革命后，新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制度建立起来，苏联的综合技术大学与法国的综合工科大学模式很相似，苏联的综合性大学与柏林大学模式很接近。在大学的建制之外，还设置了在工程、工业、健康、农业等专门领域的许多专业学院，分别受苏联政府的有关部门的领导和管理。苏联的体制使知识的专门化走向了极端，各个专业人才的培养都是完全根据国家宏观经济发展需要来计划的^[32]。

27. Frederick Artz,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ical Education in France 1500-1950*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England: The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and MIT Press, 1968).

28. Teng Ssu-yu, "Chinese Influence on the Western Examination System", 1942.

29. Pascale Gruson, *L'Etat Enseignant* (Paris: Mouton, 1978).

30. *Ibid.* p. 91.

31. William Johnson, *Russia's Educational Heritage*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Carnegie Press, 1950), especially chapter 3.

32. Nicholas Dewitt, *Soviet Professional Manpower* (Washington, D.C.: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1955); Alexander Korol, *Soviet Educ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and the Technology Press of MIT, 1957).

由于苏联高度的中央集权管理，人们可能会认为在这种体制中不存在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理念与实践。事实上，这样的领导体制承认高等教育理工科对专门知识的需要，在科技界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自由，理工科知识分子比一般公民享有的自由要高得多。然而，这种专门化的知识都要求统一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之下，这使科学分析和国家的道德政治方向密切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至少是在理论上为国家和社会的一元道德和政治方向奠定了基础。它的作用有一些象中世纪大学中的神学作为科学之王的作用^[33]。回顾起来，苏联的解体已经证明在事实和价值观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的薄弱。

最后要反思的是美国大学模式，它是在学院的基础上形成的，受英国传统的影响，与基督教新教联系密切。美国早期的学院只由很少的学者组成，由准备担任当地新教教堂牧师职务的年轻男性来负责，几乎没有自然科学和专业训练，只是集中在人文和实用学科的基础知识上，以服务于地方社区的需要，基督教神学作为道德指南^[34]。十九世纪美国科学的发展，德国大学模式对美国大学研究院产生的强烈影响，都给美国大学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一个新的教育体制产生了，本科教育仍旧保留博雅的特征，确保所有的学生都修习一定的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课程。而研究生教育则与基础科学，人文科学以及专业教育的教学和科研相结合。

美国的学院几乎没有什么自治可言，其董事会是由地方宗教和政治团体成员组成并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然而，大学在十九世纪后期开始获得自治，那时基础科学研究得到发展，许多专业领域得以产生。同样，在宗教势力强烈反对讲授有争议的学科内容（如进化论）的情况下，大学进行了捍卫学术自由的抗争。这与德国的情况很不一样，那里的学术自由是被相对专制的政府所提倡和保护。美国的这种情况也与其占支配地位的实用主义哲学相联系，在一些哲学家例如查尔斯·皮尔士（Charles Peirce），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著作中，都反映了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问题的关注和解决。欧洲大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事实与价值观之间的二元主义对美国来说可接受性很小^[35]。

33. L.G. Churchward, *The Soviet Intelligentsia*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3).

34. Richard Hofstadter and Walter Metzger,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5).

美国学者曾一直为更广泛的学术自由而奋争。而在欧洲，纯理论和高度分化的知识领域都与学术自由相联系。美国学者不太容易摆脱政治的关注和社会的压力，也不可能丢弃早期学院的特征——综合的知识形式。因此，美国大学模式对中国学者有一定的吸引力。中国的学术传统反对狭窄的专业化，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浸入了价值观，而且应该由其在实践中的效果来判断和评价^[36]。这个观点来自于汪永铨和李曼丽的对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反思（见第24章）。

西方大学的四种模式都有明显的共性，都根源于所承袭的中世纪大学的宗旨。当然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模式在二十世纪与中国大学的互动。四个模式的另一个共同点是，一直到十九世纪，妇女都被排斥在高等教育之外。对于知识和高等教育机构的态度和理念都来自于以男性为主导的科学和学术界。当大学处在迅速发展的时期，当它在全世界都被当作现代化进程的必要部分时，妇女才开始她们漫长的参与高等教育的征途。首先是要争取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其次是要力争作为大学人员的平等的高等教育参与机会^[37]。

一旦被允许进大学，妇女们才开始接触和了解大学知识的结构和学校的管理模式，结果她们发现，这些都与自己原来的认知和互动方式非常遥远^[38]。

35. Joseph Ben-David,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Directions Old and New* (New York: McGraw Hill Book Co., 1972), p. 75 gives the following explanation: “the assumption...that it was not the task of the college to provide moral guidance to its students, and that the students had to be treated as responsible adults and left to their own devices did not fit the American situation. It did not quite fit the situation in Germany and the other countries in Europe from which the idea was copied either, but it fitted the United States situation least of all. The political and moral order of American society, as was shown by de Tocqueville, was based on the moral authority of local communities and religious groups and not on the ideal of self-directing moral personality, or the authority of a national elite serving as a model for everybody”.

36. David L. Hall and Roger Ames, *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 Dewey, Confucius and the Hop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Chicago and La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1999).

37. Suzanne Stiver Lie and Virginia O’Leary, *Storming the Tower: Women in the Academic World* (New York: Kogan Page, 1990).

38. M.F. Belenkey, B.M. Clinchy, N.R. Goldberger, and J.M. Tarule, *Women’s Ways of Know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一些学者象珊卓·哈丁（Sandra Harding）^[39]和卡罗琳·莫扎特^[40]批评了大学理性主义的机械教条特征、为达到学术研究自由而提出知识与价值观的二元主义、强调客观性而将主客观相分离、在自然资源中抽取概念并试图征服自然中“非理性”的因素等。近年来，这些批评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大学研究的批评性文献中出现的很多，例如布鲁斯·韦勒士尔（Bruce Wilshire）^[41]和马克·斯维亨（Mark Schwehn）^[42]就批评了大学的认识论模式的不恰当性和大学的结构不能有效地解决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问题。

在这本书的第一章中，汉斯·韦勒（Hans Weiler）已经鉴别了西方大学已确立的知识模式将要面对的一系列挑战，探讨了这些知识模式确立的途径以及其抵制变革的深刻根源。很清楚，这些知识模式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与此同时，它们也使大学在这个过程中很难有效地面对来自文化、精神和环境方面的严峻挑战。

我希望这一章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些背景知识。大学是特定时代和文明的产物，其他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丰富遗产可能会传递和影响到二十一世纪的大学。本书的作者们在这个主题上都进行了不同范围的多角度反思：吉书力（Ji Shuli）叙述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艾力译拉（Al-Zeera）讨论了伊斯兰社会科学的新范式，科克尼斯（Kirkness）和巴哈特（Barhardt）评价了加拿大土著年轻人愿意带到大学中分享的民族精神遗产。

本章的讨论将继续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从中会看到西方大学模式移植到中国文化和认知环境中所遇到的矛盾和冲突。经历了大约一百年的实验和变革，中国建立的大学才终于能够将自己的文化遗产与外国引进的模式结合起来。这些大学对于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高等教育对话将会做出重要的贡献。

39. Sandra Harding,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Sandra Harding, *Feminist Epistemology: Social Science Issues*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Sandra Harding,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Thinking from Women's Live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40. Carolyn Merchant, *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San Francisco: Harper and Row, 1980).

41. Bruce Wilshire, *The Moral Collapse of the University: Professionalism, Purity and Aliena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p. xxiii.

42. Mark Schwehn, *Exiles from Eden: Religion and the Academic Life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40.

在充满冲突的世纪中得以生存发展的中国现代大学

中国现代大学的出现与欧洲和北美在二十世纪初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国古代历史悠久的、令人自豪的高等学府和科举考试于1905年均被废除了。那时，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朝代 – 清朝被推翻，1911年的革命宣告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束。在当时的社会转折时期，效仿西方建立新大学的决定是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生存的大事。改革的倡导者中许多都是封建王朝时知识体制中的教育或政府要员，与当时欧洲的自信与辉煌的成就相比较，中国的有识之士对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感到失望和担忧。

早期倡导中国新大学的开明知识分子中，有几位是活跃的女权主义者。他们认为，中国妇女千百年来在封建社会中忍受屈辱，因此她们最能体会到被帝国主义势力支配对中国人造成的无权和受屈辱的痛苦。中国的进步男性在自身受屈辱的社会处境下，深刻地体验到妇女长期以来所忍受的屈辱和不平等。在30年代，有人就撰写了中国妇女的第一部历史^[43]。这样，与西方姐妹们相比，中国妇女是在较小的社会阻力下进入了高等教育。当时的高等教育环境对中国知识女性来说并不十分远离她们自身的经验，这是因为，与当时从国外引入中国的现代科学和工业化相联系的知识模式尚未深深地溶入到中国文化之中。中国的新大学延续了中国学术传统的综合知识模式，这就使高等教育成为这样的场所：男性和女性一起来发展对国家生存与现代化有用的理性、道德和精神诸方面的新知识。

我们在前面已经注意到，西方的四种大学模式 – 德国的、法国的、美国的和苏联的，对于中国近代化的不同时期都产生了不同的，但极其重要的影响。这里只简要回顾北京大学的情况：她根据德国的模式而形成，之后受中国古代书院的进步传统而修正，此外还受美国大学所影响。我们的描述从蔡元培开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是中国近代的吉尤利奥·艾乐尼（Giulio Aleni），他熟知德国和法国的大学传统及模式，通晓学术哲学的综合知识。

蔡元培生于1868年，早年就学于中国的传统书院，通晓中国文化知识经典。他也参加过科举考试，于1892年荣获翰林（Hanlin Academician）最高荣誉^[44]。

43. Chen Dongyuan, *Zhongguo funu shenghuoshi* (A History of Women's Lives)(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28). See pp. 366-68 for discussion of an article written by Chen Duxiu, in *Xin Qingnian* (New Youth) in 1916, where he made the point that Chinese Women could best understand the sense of oppression that Chinese men then felt in the face of global imperialist pressures.

44. William Duiker, *Ts'ai Yuan-p'ei: Educator of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Park and London: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7).

他在西学学习中第一个引路人是一个华人耶稣会会员，马相伯，当时在南洋公学^[45]这个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高等学府当教师，蔡元培在做大学教师时，曾向马相伯先生求教拉丁语和哲学。后来，蔡元培两次去欧洲留学（1906 - 1911，1912 - 1917），分别在雷甫格大学（Leipzig）和柏林大学深造，同时帮助在法国里昂建立了一所中法大学^[46]。

蔡元培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主要体现在1917年至1923年期间他对北京大学的改革上，那时他第二次从欧洲回来担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确信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这与德国模式非常接近，这对于中国现代大学的学术发展极其重要。关于大学的管理，蔡元培提出要“教授治校”而不是由政府官员来治理。他聘用了许多具有不同学术观点的著名学者，从而鼓励百家争鸣。关于学术争鸣，他的著名的提法是“兼容并包”意思是接纳包容所有的思想和观点，提倡争鸣以求得学术发展^[47]。这与学术自由的概念不太一样，与智力自由的概念很接近。从下面他的自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违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48]。

在德国学术传统的影响下，蔡元培坚持将纯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分开。他改革了北大的课程，将工程学和法律学调整到专门学院，加强人文与自然科学的基础领域。哲学和心理学都被看作是综合领域，认为所有的学生都应该修习。蔡元培也十分关注道德问题，他认为，与儒学等信仰相比，道德问题与美学的联系更为密切。他相信，社会道德方向应该由理性的辩论而产生，因为这样既能激励自我修养又能促进社会发展。这种精神能够通过美学（从文学到视觉艺术）的复兴来培育。作为一名不可知论者，他非常包容所有的宗教信仰，也非常尊重他的罗马天主教老师马相伯。马相伯信仰宗教，但他极力反对国教^[49]。

45. Lu Yongling, "Standing Between Two Worlds: Ma Xiangbo's Educational Thought and Practice", in R. Hayhoe and Y. Lu (eds.), *Ma Xiangbo and Mind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M.E. Sharpe, 1996), pp. 158-159.

46. R. Hayhoe, "Catholics and Socialists: The Paradox of French Educational Interaction with China", in R. Hayhoe and M. Bastid (eds.), *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Industrialised World: Studies in Cultural Transfer* (New York: M.E. Sharpe, Toronto: OISE Press, 1987), pp.109-112.

47. Document 58, "Ts'ai Yuan-p'ei's policy for Peking University", in John Fairbank and Teng Ssu-yu,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238-239.

48. Wen Rumin, Zhao Weimin (ed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7.

49. Ma Xiangbo, "Should a Head of State preside over religious ceremonies?", in R. Hayhoe and Y. Lu, *Ma Xiangb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pp.241-252.

蔡元培效仿德国模式，使北京大学在纯理论知识发展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同时也意味着，他鼓励大学学者与政治行动主义保持某种距离。当他对不同流派学者进行学术争鸣的培育而迸发出1919年五四运动时，他也支持新文化运动的革命性，但是他反对学生的政治行动主义。他看到大学直接参与政治，自己心里觉得很不安，所以他后来辞掉了大学校长的职务，要求学生对当前的政治行动采取克制态度，以致力于长远的社会发展^[50]。

蔡元培一直积极倡导妇女接受教育。1902年，他建立了一所爱国的女子学校。1912年，作为教育部长的蔡元培，倡导男女同校和改善女子教育。1920年，他使北京大学向女学生开放，北大成为当时中国第一所招收女学生的公立大学。当他1928年再度成为教育部长时，他把在各级水平上排除妇女教育的障碍作为其工作重点^[51]。

蔡元培也极其欣赏法国的大学模式，其大学是整个教育制度的领导，大学作为中立的机构，独立于政府，这对于保护学校以避免政治干预具有重要作用^[52]。作为教育部长，他试图引进法国的大学学区模式，所有的学校在其归属的学区接受大学的领导和指导^[53]。当这个尝试失败后，他又成立了科学院（Academica sinica），这是国家级独立的最高学术中心，这在某种程度上受了法国科学院机构模式的启发。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他帮助建立了中法大学，其校园分别位于中国的北京、上海和法国的里昂。

中国大学发展到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对其发展产生主要影响的是美国。在二十年代中期，蔡元培聘用了一名著名的学者胡适担任北大文学院的院长，胡适是一位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哲学家。他认为，学术界应该致力于发现和解决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重大问题，从而服务于中国的长远发展。道德和政治的方向应该产生于广泛的社会辩论，而不应该被事先设定好，无论是儒家的价值观还是现代的“主义”例如马克思主义等都不应该被预设^[54]。

50. Cai Yuanpei, *Cai Yuanpei xuanji* (Selected Writings of Cai Yuanpei)(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59), p.98. See also Duiker, *Ts'ai Yuan p'ei: Educator of Modern China*, pp.69-74.

51. Duiker, *Ts'ai Yuan p'ei: Educator of Modern China*, pp.10, 64-5.

52. R. Hayhoe, "Catholics and Socialists", pp. 109-112.

53. Allen Linden, "Politics and Educa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Case of the University Council 1927-1928",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7, No. 4, August, 1968.

54. Hu Shi,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New Thought", Document 62 in Fairbank and Teng, *China's Response to the East*, pp. 252-5. See also Jerome 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在胡适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时，他支持蔡元培建立一个国家级的研究机构，主要对中国古典文学、哲学、历史和世俗规范等进行批判性的解释和评价工作。学生和教授们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独立地进行工作，颇具有传统的书院精神。北京的另一所主要大学——清华大学，也邀请胡适去设计同样的研究机构，并聘请了四名中国最著名的历史人文学者作为导师。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进行学术知识与伦理学（道德标准）的综合，对中国古代经典知识进行扬弃并使之应用在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当代议题中^[55]。

在1911年革命和1937年日本入侵之前这一时期建立的新院校中，有公立和私立的，也有国立、省立和地方的，约有100所，其模式和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在军阀混战的政治动乱年月，以及1928年才建立的国民党政府的能力的有限性，都意味着大学发展的主要阻力是经济。欧洲当时对中国有某些重要的影响，但美国的影响是比较强的。特别是美国传教士建立的十六所教会大学，都参与了农业、医疗、教育、以及解决饥荒方面的社会发展项目^[56]。早在1928年，一名中国妇女在美国拿到了化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她是吴怡芳，担任了金陵女子学院的校长。

总的来说，中国这些新大学都具有自由主义精神，这首先是由北大的蔡元培所倡导，之后又由胡适及许多留美归国学者所发展。被蔡元培极为担心的学术知识与政治行动的冲突逐渐地被发现可以通过这样的途径来解决：日益重视应用知识，从而在社会、经济甚至是政治方面发挥实际的作用^[57]。

在抗日战争期间，从1937年到1945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都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在整个战争期间，在西南边远的昆明西南联大继续发挥着自由主义模式的大学作用。西南联大在最困难的形势和环境下进行运转，其重要而突出的学术标准说明了美国与德国的学术传统与中国传统书院的某些方面进行了很好的结合，这种多元的价值观具有巨大的潜力。约翰·依斯拉尔（John Israel）最近出版的西南联大历史一书，用大量的历史资料展示了西南联大丰富的学术生活：由于近代化与战争的二难状况引起的对中国古代文学、历史与哲学的重新思考；西方风格的社会科学对中国社会与经济现实的借鉴；高等学府作为学术团体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书院式或西方大学的角色）等等。在极其困难有限的条件下，西南联大的基础科学研究质量仍旧是很高的。

55. Ding Gang, "The Shuyua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R. Hayhoe and J. Pan (eds.) *East-West Dialogue in Knowledge and Higher Education* (New York: M.E. Sharpe, 1996), pp. 218-244. Hu Shih was later to serve as Ambassado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938 to 1942, and as the last presid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under the Nationalist regime, after it returned to Beijing in 1945.

56. Jessie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Ithaca, New York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57. Yeh Wen-hsin, *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0) gives a detailed and contoured picture of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over this period.

后来有两位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都毕业于西南联大。此外，工程学，包括战争时期所需要的航空工程学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当时的西南联大远离战争期间的重庆都城，又受到云南省省政府的保护，该省不太受国民党的控制，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大学的自治。在知识发展方面，西南联大由对理论领域的基础研究逐渐转移到与国家生存与发展有关的教学和科研上。依斯拉尔生动地描述了西南联大从知识的纯自由主义理念即强调学术自由，到它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转变，即西方大学的学术自由与中国书院的智力自由的结合，然后又与中国当时战争的现实相结合：

在为了办教育而同甘苦共患难的过程中，教师们和学生们都是很齐心的，形成了一个很有凝聚力的社团。与战前很有地位的大学相比，西南联大更象是传统的书院。在抗战期间的联大人引以为自豪和满意的是，他们拥有“充满活力的，乐观的和创造性的精神生活^[58]。”

这种对中国的、欧洲的、和美国的学术价值观优势的结合使得在战争沙漠的灾难中出现了这个文化的、社会的和科学思想的绿洲。

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一政治和经济的剧变归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毫不奇怪的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中国越来越受欢迎，那时的中国迫切要求摆脱奴役和压迫并成为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它的道德－政治方向及其充满信心的主张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它宣布中国终于在这个世界上独立了，站起来了。许多中国大学的学者都很拥护这个革命，希望大学能够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发挥作用。西方大学与中国书院的结合应该是最好的模式，但在50年代，中国的大学被苏联模式所取代。因此，中国大学的许多学者也对真正的现代文化特征保持批评反思的角色。这些知识分子中有哲学家马旭伦；新中国第一位高教教育部部长马寅初，是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的经济学家，曾被任命为北大校长；梁漱溟，他以其对儒家的固执信仰有时被称为中国的最后一位儒家^[59]。他们认为近几十年来引入中国的西方模式的长处应该与中国书院的先进之处结合起来，以服务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且毛泽东本人就高度欣赏书院传统^[60]。

58. John Israel, *Lianda: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31-332.

59. Guy Alitto, *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especially pp. 322-324.

60. Ding Gang, "The Shuyua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1996, pp. 235-237.

然而，相反的事情悲剧性地出现了，所触发的一系列冲突一直影响到80年代。在十年中急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新中国的领导邀请苏联专家根据苏联的路线来策划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整体改革^[61]。这就导致了大量的高等专门院校的建立，并都分别归入中央对口部门的领导之下。综合大学数量很少，只设基础的人文与自然科学的系科，而工科大学则主要设各类工程学。在二十世纪前半叶，所有的中国大学都被重新改造和建构，以适应新的教育体制。新的教育体制又被统一到国家的每一个五年发展计划的人力规划之中^[62]。

智力权威和知识权力垄断作为古代科举制的特征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开始对新的社会主义教育体制产生影响。新成立的“人民大学”被称为“我们的第一所现代大学”，根据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所提出的教育宗旨，在于通过教育“将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来领导新的体制。在人民大学之下，每一个地区都有一个政法学院，要求具备“政治培训”的质量。这些政法学院是在地区水平上起到支持人民大学的作用，其任务是“摧毁中国旧的意识形态及其机构”^[63]。刘少奇是《<<怎样成为一名好的共产党人>>》这本很有影响的书的作者，这本书强调党员的自我教育与修养，其中充满了中国古代经典中所强调的纪律和服从^[64]。

所建立的人民大学只有八个系：财经、贸易、经济规划，合作社、工厂管理、法律、外交和俄语。人民大学是整个高等教育制度的最高点，其任务是干部培训以管理整个社会主义体制。自然科学及其他领域都被设置在从属性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因为刘少奇在1950年10月3日人民大学成立日讲话时讲到，资本主义的自然科学与无产阶级的自然科学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65]。实际上，人民大学是要成为新形式的翰林院，仲裁和决定符合意识形态的世俗法规和知识，为政治理论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教学提供指南。

61. Deborah Kaple, "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in the 1950s", in Odd Arne Westad (e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17-140.

62. R. Hayhoe, *China's Universities 1895-1995: A Century of Cultural Conflict* (Hong Kong: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9, chapter 4.

63. Liu Shaoqi, "Speech at the Ceremonial Meeting for the School-Opening of 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 in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ed.), *Collected Works of Liu Shao'ch'i 1945-1957* (Kowloon: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1969), pp. 235, 236.

64. Liu Shaoqi, "How to be a good Communist", in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ed.), *Collected Works of Liu Shao'ch'i Before 1944* (Kowloon: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1969), First version, 1939, pp. 151-218, Revised version, 1964, pp. 219-283.

65. Liu Shaoqi, "Speech at the Ceremonial Meeting for the School-Opening of 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 pp. 237-238.

这种现代高等教育的苏联模式同时有两种深切的关注 – 通过培养迅速现代化所需要的专业人员来赶上发达国家；形成共同一致的道德政治指南以取代传统的儒家思想。

从第一个关注来看，由于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在全国广泛建立起来，就象蔡元培的法国大学学区梦想得以实现一样，中国50年代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同时，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数量在增长，在基础专业和工程领域中也有相对大的比例。

从第二个关注来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于科学分析和道德政治发展的关系很快让路于党内的权力斗争，其中毛泽东关于社会改革的激进观点与刘少奇的亲苏态度产生了明显的冲突。1958年至1966年之间的教育改革所引起的矛盾是很有害的，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在党内走苏联路线的人和支持毛泽东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观的激进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便是这个矛盾激化的结果。清晰的道德政治指南和繁荣统一的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梦想就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破灭了。

只是到了八十年代初，当邓小平宣布中国改革开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时，解放之前所建立的近代大学的丰富经验才得以发掘，所从事的改革也允许外部世界的各种影响来与中国高等教育的新发展来互动。也只是在近些年来，中国境内的学者才能够加入到众多海外华人对儒学的探讨上，他们在搞引进“儒学项目”，并以此来与“启蒙运动项目”的西方批评进行对话，例如与珠尔根·哈伯玛斯(Juergen Habermas)^[66]进行对话。

有许多史实都可以证明，当代中国大学在一个世纪中所形成的将书院的进步传统与欧美大学模式的优势相融合创设了的丰富的智力生活。近些年来，中国大学的一个主要改革是进行高校合并，包括对在苏联模式影响下的专业分工过细的问题进行改革，将过窄的专业进行合并和整合。医学院和农学院都被合并到综合大学，像是一个历史的反转。1952年根据苏联模式对大学机构进行重建，专业学院都从大学中分离出去，现在这些专业及其机构又团圆到它们原来的学术大家庭之中^[67]。清华在1952年被设定为综合技术大学，因此，撤消了人文和社科领域的所有系科。而现在，清华大学建立了中国哲学思想的综合性研究中心，旨在找回它昔日曾经拥有的人文研究优势。同时，北京大学当年被分离出去的医学院现在也合并回来了。

66. Tu Wei-ming, "Toward a Third Epoch of Confucian Humanism", in Tu Wei-ming, *The Way, Learning and Politic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pp. 141-159.

67. For a few examples, see R. Hayhoe *China's Universities 1895-1995*, pp. 259-260.

中国的大学应该是国际社会交流中国丰富的文明遗产的一个重要渠道。那么，中国大学在多大程度上享有自治与学术自由？当然还是有一些阻力存在的。然而，1998年5月4日的北京大学100周年大庆体现了著名的高等院校在中国和在国际社会的新地位。校庆仪式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从世界各地有100所名牌大学的校长前来参加，祝贺北大成立100周年。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参加了校庆大会，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也是第一次。江泽民主席在这个重要场合的讲话中，其核心的词语就是“科教兴国”，这是中国公认的在下一个发展阶段重点大学的核心任务。

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值得注意的另一个发展特征是，妇女在高等教育中的参与比以前明显增多。据1998年统计，30岁以下的大学老师中48%是女性，女教师占教师总数的比例是36%^[68]。妇女对知识的更综合，更跨学科的态度越来越有利于她们进行课程开发。如今，妇女在某些领域已处在研究的前沿，例如社会学和人类学^[69]。根据国际上的比较标准，中国在基础科学和工程学领域的女学者的比例是相当高的，这是由于50年代大量的女性被鼓励进入理工科专业领域的缘故。当中国的大学在国际场合与世界各国的大学进行越来越深入广泛的对话时，妇女将会和男性一样成为活跃的对话者。

中国高等教育对西方的借鉴

这一章回顾了欧洲大学与中国高等学府的关系与联系，对二者之间在机构模式，知识的组成以及两种传统的核心价值观进行了对比。这一章概括了欧洲大学在四个不同的近现代发展背景中的演进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大学始终坚持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尽管西方大学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大学的专业化趋向、认识论的二元论、以及价值观无涉的立场，都使之在二十世纪面对道德与政治困境时显得很有局限性。四种西方大学模式对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产生影响的方式引起人们关注价值观问题，以及道德－政治的，精神的和学术知识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想简要总结的是，中国高等学府的机构模式和认识论的某些方面值得西方借鉴和学习，这些方面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大学的产生与发展，并增强了大学面对21世纪挑战的能力。

68. Department of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Ministry of Educatio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ucational Statistics Yearbook of China 1998* (Beijing: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1999), p.32.

69. Christina Gilmartin, G. Hershatter, L. Rofel and T. White (eds.) *Engendering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随着因特网时代的信息激增和现代科学知识在某些领域的巨大可能性，例如遗传学改变人的基因，人类面对的选择也越来越多。大学在道德决策中的作用是什么？大学能够怎样帮助我们判断信息聚增中最有价值内容？大学能够在社会的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结构和模式越来越透明的情况下为寻求精神发展提供指南吗？在基督教、犹太教以及在西方哲学中，这些都是被强调的问题，然而，大学的制度模式和认识论导向并没有促进这类探究，这种作用可惜我们的西方大学不能采用和借鉴。在此，值得考虑的是，中国学术传统以及儒家哲学应该怎样在这方面充实和发展大学的能力。这一章的重点是中国，但是其他东方文明的传统也有许多贡献，正如这卷书前面部分所讨论的。

美国哲学家罗伯特·古铭斯·尼韦勒（Robert Cummings Neville）在1998年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指出：“在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成为可能——任何一个在世界范围的哲学文化中的自我意识参与者都会说，儒家思想与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等哲学具有同样的生命力，从中可以学习，呈现和扩展。”儒家思想进入世界哲学文化是一个历史时刻，海外华人学者例如杜维明使之成为可能。尼韦勒指出：“人类社会绝不会被文明化，除非一个真正的世界文化得到发展。这个世界文化尊重各种不同的文化并能协同一致地对环境保护，正义和人类生活的和谐做出决定性的反应^[70]。”

尼韦勒注意到西方的社会科学趋于不完整并迷惑于规范层次的议题，他提出儒家思想可能具有挽回和补救的作用。他呼吁人们注意“长达几千年悠久的儒家思想传统反映了文明人与野蛮人的不同，人与社会生活的好的规范与差的规范的不同，以及好的习俗惯例与差的习俗惯例的不同^[71]。”他指出，儒家思想可能会克服盛行于西方社会科学的二元论：“西方的伦理理论强调个体的行为以及这种行为的原理和目标；西方的政治和社会理论强调实际的历史机构和社会结构。仪式习俗则处在这之间并包含了二者中的规范^[72]。”“一个新的关于仪式习俗的儒家理论提出了在多元化、社会分化和冲突时代的对待规范的更有效的方法^[73]。”

70. Robert Cummings Neville, "Tu Wei-ming's Neo-Confucianism", in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Vol. 5, 2000, pp.163, 169.71. *Ibid.* p.187.

71. *Ibid.* p.187.

72. *Ibid.* p.188.

73. *Ibid.* p.190.

在近几十年来将儒家思想介绍到国际社会的带头学者杜维明，阐述了启蒙运动在工具理性主义价值观，个人自由、自我利益，以及物质进步和权利意识等方面的二难状态。他提出，那些制造繁荣和取得成功人同时也制造了社会和环境问题。在杜维明最新出版的一本关于儒家思想与环境的书中，他简明地总结了儒家思想中关于关系和过程的论述，他认为这些就是对启蒙运动难题的回答：

儒家的方式是学会做人的方式。在儒家精神中学会做人就是要使自己无休止地、永远不断的进行自我修炼的过程.....学习的目的被理解为是为了自己的缘故，但是个人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象一个岛屿）；而是处在许多关系的中心（象一泉流水）。自我作为互动关系的中心，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系统而不是封闭的、静态的结构。因此，在自我与社会群之间的相互依存，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一致，以及与上天的交流作为人类生活的最显著特征和最高的价值^[74]。

这些关于互动联系和整体的重要性长期以来是与东、西方妇女的认识方式相关的。因此，用一个杰出的女社会学家的某些思想来做这个结论应该是恰当的。她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她以非常独特的女性主义视角来提出中国的学术传统可能对国际社会做贡献的方式：

妇女研究的产生与发展其本身就是反对传统学术的一种“革命”.....妇女的敏感性，同情心和善于倾听他人意见的长处，避免和解决冲突的愿望以及关于世界的经验和直觉，易于与他人友好相处，对所坚持之事的执著和勇气等等都带给了妇女研究以特殊的活力.....。当代西方社会学，信奉精确的科学、技术和数学，对妇女研究能够提供的帮助极为有限。相比较，人类学关注文化差异，它的对不同群体的丰富不同的生活进行深入的探究，以及它的简单而朴实的理论、方法和结果，都是值得学习和使用的.....。^[75]

从对中国学术传统的探讨中，我们的主要收益是什么？我认为，我们需要发扬中国的这些传统：它主要是在理论与实践、知识与价值观、个体与社会、社会组织与政治 -

74. Tu Wei-ming, "Beyond the Enlightenment Mentality", in Mary Evelyn Tucker and John Berthrong (eds.), *Confucianism and Ecology: The Interrelation of Heaven, Earth and Huma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World Religion,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3-14.

75. *Ibid.* p.78. Chen, Yiyun, "Out of the Traditional Halls of Academe: Exploring New Avenues for Research on Women", translated by S Katherine Campbell, in C. Gilmartin et al.(eds.), *Engendering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社会 - 自然环境之间联系的建立与恢复上的重要价值。欧洲大学的核心价值观是自治与学术自由，这对于近代科学和工业化的产生与发展是极为重要的。然而，西方大学在以上方面制度性的分离已经使西方大学在面对从法西斯主义到自然环境被破坏等一系列价值观危机时出现了极大的困难。相比较，在中国的学识世界中，无论从高等学府的结构，还是从认识论的倾向性来看，都是更灵活、更易于改变的，并没有把自己与自然环境、政治制度、和宗教权威严格地割裂开来。这使它既易于受社会冲突的伤害也易于受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从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况。然而，中国的大学也没有想放弃它在道德、政治和精神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智力自由的价值和某种学术的地方主义（即书院的地方性），是与当地的社会、政治和精神思想方面的斗争紧密相联系的。它不能独立或超脱于社会之上，但却有机地溶合在它的生存环境之中。